

刘振佳◎主编

大学中庸 诠释解

中华
经典
诠释
解



山东友谊出版社
Shandong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

刘振佳◎主编

大学中庸 诠解

中华经典
诠解



山东友谊出版社
Shandong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中庸诠解 / 刘振佳主编.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12.9(2014.05 重印)

(中华经典诠解; 1)

ISBN 978-7-5516-0207-5

I. ①大… II. ①刘… III. ①儒家②《大学》—注释
③《中庸》—注释 IV. ①B2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6734 号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250002

电 话: 出版管理部(0531)82098756

市场营销部(0531)82098035(传真)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规 格: 170mm×240mm

印 张: 58.5

字 数: 890 千

定 价: 126.00 元(全三册)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出版管理部联系调换)

编 委 会

主 任：庄金兰 杨朝明

委 员：张文科 胡志平 曾振宇 刘振佳 张 斌

总 编：张文科

副总编：胡志平 张 斌

《大学中庸诠解》

主 编：刘振佳

编 委：毕孝珍 张言昌 唐延军



目 录

大学诠解

前 言	(3)
经一章	(27)
传之首章 释在明明德	(33)
传之二章 释亲民	(36)
传之三章 释止于至善	(39)
传之四章 释本末	(44)
传之五章 释格物致知	(46)
传之六章 释诚意	(48)
传之七章 释正心修身	(52)
传之八章 释修身齐家	(54)
传之九章 释齐家治国	(57)
传之十章 释治国平天下	(62)

中庸诠解

前 言	(75)
第一章 天命章(纲领)	(93)
第二章 时中章(知人)	(97)
第三章 鲜能章(正心)	(99)
第四章 行明章(正心)	(101)

第五章 不行章(修身)	(103)
第六章 大知章(审问)	(105)
第七章 予知章(明道)	(108)
第八章 服膺章(正心)	(110)
第九章 可均章(正心)	(112)
第十章 问强章(明道)	(114)
第十一章 素隐章(正心)	(117)
第十二章 费隐章(知物)	(119)
第十三章 不远章(笃行)	(122)
第十四章 素位章(修身)	(125)
第十五章 行远章(齐家)	(128)
第十六章 鬼神章(齐家)	(130)
第十七章 大德章(知天)	(132)
第十八章 无忧章(齐家)	(135)
第十九章 大孝章(齐家)	(138)
第二十章 问政章(治国)	(141)
第二十一章 诚明章(知性)	(153)
第二十二章 尽性章(诚意)	(156)
第二十三章 致曲章(诚意)	(159)
第二十四章 前知章(治国)	(161)
第二十五章 自诚章(诚意)	(163)
第二十六章 无息章(博学)	(166)
第二十七章 大哉章(修身)	(170)
第二十八章 自用章(明道)	(174)
第二十九章 三重章(明辨)	(177)
第三十章 祖述章(知法)	(181)
第三十一章 至圣章(修身)	(184)
第三十二章 经纶章(诚意)	(187)
第三十三章 尚絅章(正心)	(189)
后 记	(194)

大学 诠解

前 言

《大学》是传统儒家的重要经典著作,虽然没有被列入经书,但是,宋代朱熹将其编入“四书”,其后近千年,成为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的规定教科书,对中国社会整体文化构成和流变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

“大学”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原指古代的一种学制。古代的儿童一般在四岁的时候,就要进行启蒙教育,学习“三百千千弟子规”,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等。同时,初步接触“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经典书目,为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宋代朱熹曾经专门写过一篇《童蒙须知》,分别从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杂细事宜五个方面对启蒙教育作出规定,认为“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违,自不失为谨愿之士。必又能读圣贤之书,恢大此心,进德修业,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汝曹宜勉之”。这些在学习生活方面的规定,不仅可以使人规范自己的行为,成为“谨愿之士”,也就是一个诚

实、做事谨慎且有志愿的人,而且能够使人进德修业,培养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由此可知,古代启蒙教育就是要培养儿童认字和书写的的能力,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使之能够具备基本的道德伦理观念,并且掌握一些基本的文化常识及日常生活知识。

古人到了八岁的时候,就要进小学进德修业。据史料记载,我国的小学教育产生于殷周时期。《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即夏代称地方学校为“校”,殷商称地方学校为“序”,周代称地方学校为“庠”。校、序、庠都是当时的小学教育。至西周时期,周天子建立起了小学,此种小学设在官府,《礼记·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招收的学生自然是天子以及贵族子弟。所以《大戴礼记·保傅》中记:“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在完成家庭教育的基础上,就要到专门所设的“外舍”学习一些小的技艺以及一些小的礼节仪式。

周代所创立的“小学”,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流传久远,只是学规制度后来不断地发生新的变化,入学的年龄等均有不同的规定。作为一种称谓,两汉时,“小学”在周代教育机构及教育内容设置的基础上,又引申出了文字学的含义。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由此可见,古代的小学主要是教授文字学知识。以文字学为“小学”的概念,后来又不断演化,两汉时文字学主要是文字训诂,至魏晋南北朝增添音韵内容,至隋代又添金石刻文,唐代探讨文字笔法与笔势的书法书品也被列入“小学”。

一直到宋代的时候,“小学”不仅指称文字学,又进一步上升至文化道德修养。所以朱熹曾专门编纂出以道德教育为主的“小学”

教本。淳熙十四年(1187年),朱熹编成《小学》六卷,教育儿童“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其中《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包括:《嘉言》、《善行》。搜辑有经史子集32家386条相关内容。又作有《小学题辞》。

正是在此基础上,朱熹为《大学章句》作序,便有了关于小学学习内容及其方式的论述:“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即到了八岁的时候,不论是王公大臣的孩子还是平民百姓子弟,都要入小学修学进业,在原来启蒙教育的基础上,学习高一层次的基本礼节和生活技能。“洒扫”:洒水扫地,泛指家务事;“进退”:迎送客人之类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即古代所谓的“六艺”。“礼”:礼仪;“乐”:音乐;“射”:射箭技术;“御”:驾驭马车的技术;“书”:书法;“数”:算法。这些都是古代尤其是汉代以前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在朱熹看来,“小学者学其事”,小学阶段就是学习一些具体的知识和基本能力,为进一步学习深造打下基础。“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如果不经小学阶段的道德修养学习,就不能收其心,养其德,也就根本无法进入更高的学习阶段。

在此小学进德修业的基础上,先秦时期,按照规定,天子和诸侯后代到了十五岁的时候,就要进入大学。当时天子所设的大学叫做辟雍,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之意;诸侯国所建立的大学叫做泮宫,因为仅有三面环水(半圆环)。所招收的学生均为天子和诸侯的弟子,其他人不得进入大学接受更高一层的知识与理论教育。这就是《白虎通》所谓:“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是也。”十五岁必须进入大学继续深造。《大戴礼记·保傅》所谓:“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

履大节焉。”进入大学之后,将头发盘起,学习那些较为重要的技艺才能,掌握更高的大义名节。这种大学制度,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伴随着私学制度兴起,分为官学和私学两个系统,春秋时期有孔子所办私学和齐国的稷下学宫;汉代以后,官学变成了太学和国子监,私学变成了私塾和书院。

按照朱熹的说法,“小学涵养此性,大学则所以实其理也。忠、信、孝、弟之类,须于小学中出;然正心、诚意之类,小学如何知得?须其有识后,以此实之。大抵大学一节一节恢廓展布将去,然必至于此而后进;既到而不进,固不可;未到而求进,亦不可”(朱熹:《朱子语类》卷十四)。也就是说,小学和大学,是完全不同但是又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大学就是要在涵养此性的基础上“实其理”,寻求其中真实的道理,“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所以”,“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因甚恁地。”(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其中的“恁地”,即这么、那么的意思。朱熹的话说得很精练,小学是直理会那事,而大学是穷究那事情后面的深刻道理,所谓为什么会是这样或那样,其中的原理是什么。

具体来说,就是后来朱熹在其《大学章句序》中所言:“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中所学,就是一些关乎人生的“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方面从基本知识的学习积累上升为人生根本道理的体会感悟。另一方面,从一般性的道德蒙养驯化转变为道德理念的生成与觉悟。第三则是从最初的知识储备学习推进为生命价值的实现与创造。这是建立在遵循知识发展路径之上的。在儒家看来,当人幼小的时候,没有小学阶段的学习,就不能收拢他的放纵之心,培养他的德

性,奠定大学的根基;等到长大以后,如果不进入大学接受教育,就不能考察义理,并将之施行到各项事业中去,最终取得成功。所以,汉儒郑康成(郑玄)的解释是:“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他认为“大学”就是“博学”的意思,只是博学不仅仅是针对知识而言,更是对广阔的生命学识的掌握。

除此以外,在古人的眼中“大学”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即所谓的“大人之学”,此内涵由朱熹注《大学》中提出。何为大人?历史上有多种解说,其中有年龄成人说。它相对小学为未成年人,认为大人就是指成年人。孔子曾经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将十五岁划为人生一个特定的学习阶段。因此,古时认为年龄到了十五岁之后,便应该进入大学阶段,学习更高一层的知识与道理。“大人之学”就是指十五岁之后成年人所应掌握的学问。

另外,关于“大人之学”,还有人主张官职地位说。最早在《易经》中,便提出了“大人”一说。《乾卦·文言》上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认为所谓大人,就是有较高修养,能够通晓天地原理,遵行天地之道,甚至灵通鬼神的至高哲人。这样的“大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肯定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们不仅有较高的智慧,同时还能够尊天奉时,化泽天下。惟其如此,才能够以自己的高尚修养品德,践行“八目”的基本序列构想,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理想。

不过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观点,还是“大人之学”的道德品行说。最早是孟子,将“大人”纳入道德修养范畴,提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认为大人就是能够保持先天善性的人;又说:“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

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孟子·告子上》)大人在修养自己的过程中,会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特别“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由此看来“大人”就是能够超越世俗物质利益,追求更高远人生义理的人。

正是在孟子对“大人”阐释的基础上,明代的王阳明对于“大人之学”做了另外的发挥阐释。钱德洪曾问王阳明:“《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矣。敢问大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乎?”阳明回答:“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谓大人之学。”(王守仁:《大学问》)就是说,“大人之学”其实就是人保持自己的赤子之心,通过“明明德”,立德爱人地自我塑造,将自己放失的良知重新找回来,沿着先天道德本性修养美好的人格,最终实现成贤成圣的理想。王阳明是从心学原理出发解释“大学”。

二

综观《大学》一书的形成,从先秦时期开始,经过了较长历史演变过程,最后在宋代的时候,《大学》才成为了一本专门性的著作。

《大学》原为《五经》中《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礼记》,又名《小戴礼记》,是一部孔子弟子、门人及其后学论述先秦礼制的论文集。先秦时期,《礼记》中的文章或单篇流传,或辑录在某一个人的著作中,或被选编在儒家弟子传授的不同的“记”中,文章的作者不同,写作年代也前后不一。全书记述了以周王朝为主的秦

汉以前的典章、名物制度和自天子以下各等级的冠、昏、丧、祭、燕、享、朝、聘等礼仪及家庭、社会人际交往中的各种礼俗,表达的是儒家学派基本思想观念。

《礼记》由西汉今文学博士戴圣所编纂,其成书时间约在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汉成帝阳朔四年(前21年)前后的30年间。目前所知最早研究《礼记》的著作是戴圣弟子桥仁的《礼记章句》。东汉马融、卢植曾经对《礼记》进行过“去其繁重”的整理工作。郑玄作《礼记注》时,依据马融整理的“定本”予以诠释。《礼记注》是目前所知最早且保存最完整的《礼记》注本。《礼记》在传抄流传过程中,部分篇章,如《王制》、《郊特牲》、《乡饮酒义》、《燕义》等,有秦汉人增加的痕迹,但其主体部分应为先秦之作。

关于《大学》一篇的写作年代,历史上曾有过不同观点的争议,其中,有人认为《大学》就是先秦时期的作品,其作者就是孔子之后的儒门传人,这种观点一直是主流观点。汉代的郑玄虽然提出子思作《中庸》,却没有说《大学》为谁所做。东汉时期的大儒贾逵指出:“子思居于宋国,惧家学之不明,而帝王之道坠,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认为《大学》是“七十子后学所作”。至于为“七十子后学”中何人所作,他没有具体说明。后来的二程及朱熹也持相同观点,所谓“《大学》乃孔子遗书,初学入德之门”(朱熹:《大学章句》引)。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又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他具体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认为经是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将该书的写作年代上推至先秦时期,将作者判定为孔圣及其后人,认为《大学》一书是儒家思想传承的著作。后来清代著名学者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一书中,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

为《大学》不应该是孔子、曾子所著,因为孔子、曾子时代文简而隐、义多兼用,《大学》应该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但这并没有动摇《大学》出之先秦,为圣贤人所作的观点的地位。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大学》是属于“孟氏之儒”的著作,他断定为“乐正氏之儒的典籍”。新近随着郭店楚简等出土文献的发现,《大学》的成书年代又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郭沂认为就思想性格而言,《大学》是继承郭店楚简《天命》的修道论而建立起来的学说,认定《大学》该出自子思门人之手。(参见郭沂《郭店楚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466—473页)梁涛先生也依据郭店楚简新材料,经过对文本的具体分析考察,认为《大学》应成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参见梁涛《〈大学〉早出新证》,《中国哲学史》2000年3期)对于历史上《大学》出自先秦,为圣贤所著的观点,做出了新的论证和呼应。

除此以外,有人认为,《大学》一书出自秦汉之间。近代的胡适、钱穆等学者认为《大学》、《中庸》作者未详,著述年代也推测为秦汉时期。后来具有代表性的是徐复观等人,徐复观将《大学》成书年代与汉代初年流行的“大学”、“太学”概念联系起来考察,分析《大学》一书的特征,认为是儒家为了反抗法家而将儒家思想有计划地整理综合而成的教本。(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徐复观文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页)同时,徐先生又根据《大学》引述《尚书·秦誓》以及《尔雅·释训》,又引述《大学》等证据,推论《大学》乃是“秦统一天下以后,西汉政权成立以前的作品”。(同上书244、246页)我国当代著名学者冯友兰,不仅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中,将《大学》放在“秦汉之际儒家”一节中来讨论,还直接指出《大学》不是曾子所著,而应是荀子一派的学者

在秦汉之际所作。后来任继愈在其《中国哲学发展史》一书中,同样是将《大学》放在秦汉卷来分析和论证,认为《大学》是先秦儒学转变为董仲舒儒学的一个中间环节。

还有人主张,《大学》一书为汉代人的著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清代人陈澧,他认为《大学》与《学记》中“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一段文字相近,二者均是谈“大学之道”,当为相互发明之作;而“大学之道”,即所谓大学制度,至西汉方才形成,所以,《大学》应与《学记》一样,应该是西汉以后作品。现代以后,学术界对于《大学》的成书年代讨论渐多,其中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经过对儒家思想发展进程以及《古文尚书》、《大戴礼记》与《大学》传承关系的分析考证,具体断定《大学》就是汉武帝以后的作品。此种观点曾受到许多人反对,并不为人们所接受。

《大学》一书的成书过程,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汉代刘向在《别录》中,将其编入通论类,把《大学》看作儒家思想通论性作品。虽然后来有东汉郑玄为其作注,唐代孔颖达为其作疏,但是唐代以前均未独立成书,也没有用单本发行过此书。韩愈为建立道统以辟佛释,极力尊推《大学》一书。在《原道》中,他引用《大学》经文作为驳斥道教、佛教的依据,认为道教和佛教重无为虚无,只讲治心,不理天下,致使天下伦常残破;儒家的《大学》之道,虽然也讲治心修身,但是把正心诚意与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让人有所作为,在社会具体实践上实现“明明德于天下”。正像后来清代学者全祖望所言:“韩愈作《原道》,实阐正心诚意之旨以推其于《大学》。”(全祖望:《鲋埼亭集》外论卷三,《李习之论》)韩愈作为道学的开山人物,其极度推崇《大学》的观点和举措,对后来的宋明理学发掘《大学》意蕴、深化儒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